

华夏遗韵

Hua Xia Ancient Musical Remains

中原古代音乐文物

Musical Cultural Relics Discovered in Central Plains

河南博物院 编著

Compiled by Henan Museum



河南博物院
HENAN MUSEUM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夏遗韵: 中原古代音乐文物选集 / 李宏主编.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348-3144-7

I. ① 华… II. ① 李… III. ① 音乐—历史文物—河南省—古代—图集 IV. ① K87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4184号

hua xia yi yun zhong yuan gu dai yin yue wen wu
华夏遗韵: 中原古代音乐文物

责任编辑: 王小方

责任校对: 孙 波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2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华夏古代音乐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情感与生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良莠不齐的现代音乐潮流中，中华民族音乐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华夏古代音乐不仅带给中国和世界一个文化的记忆，而且带来一种中华音乐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历史资源。

河南地处中原，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中一直处于核心地区，自古为华夏礼乐之邦，音乐历史发展更是得天独厚。在古代文献中，不乏黄河流域原始部落的葛天氏之乐、大禹治水之歌的《大夏》之乐，商人“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卫之声，更是作为一代新音乐的代表。两汉时期本土音乐，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音乐和中原音乐的汇流、古琴音乐的兴盛，隋唐洛阳东都的歌舞大曲，北宋汴京城勾栏瓦舍中出演的散乐杂剧，等等。悠久的历史，带来丰厚的音乐文物遗存，中原大地上古代音乐文物的发现不仅类别丰富，具有典型意义，且发展谱系完整，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宋元明清，源远流长，几千年连续无间。

我们从这些古老的音乐文物中可以聆听到远古文明渐行渐近的足音。中华文明也就从古老的史书中、从锈迹斑斑的文物中、从穿越历史的乐音中走出来，变成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形象，给我们带来心灵深处的震撼和感动。

在中原古代音乐文物面向整个世界之际，我代表河南博物院，真诚地希望将这种震撼和感动传达给社会各界的每一位朋友。

河南博物院 院长

张文军



随着古代音乐文物的络绎出土，中华民族音乐发展史被这一次次欣喜地发现而改写。它摒弃了中国音乐起源的神话学支撑，结束了有关上古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起源的争论，更新对中国古代乐律水平的认识，打破了音乐史治史的文献史料的局限。这些音乐文物是古代乐音的真实载体，凝结着中国古代旋律和音容的全部秘密。为解开这些谜团，复活远古灭绝的艺术，建立富有生命力的音乐博物馆，音乐文物的复原与研究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学术阶梯。有助于重写全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

随着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发展，更多与音乐相关的重大发现带来了音乐考古学的快速成长，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音乐活动所遗留下的各种遗物和遗迹。音乐考古学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和发掘的实物资料，以考古学的方法，阐明古人音乐实践活动，进而探讨音乐文化的发展。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有关音乐的遗存一般分为器物 and 图像两大部分，器物主要是各种质地的乐器类。而图像则如乐俑、与音乐艺术活动有关的器物铭文，各种器物绘饰、堆塑、雕砖石刻、洞窟壁画以及涉及音乐内容的图书、乐谱等，内容广泛。音乐考古学与人类各种族的音乐和文字记载的音乐活动同样有密切的关系。近年来，科学技术更多地进入到音乐考古的领域，有关乐器的年代测定法，青铜乐钟与冶金学、古代乐器的录测音中所涉及的现代音响学问题，都随着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深入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其中，实验考古学对于音乐考古成果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从无声到有声，使得过去停留于古代文献的音乐历史，成为了一门充满魅力的学科。

有关华夏民族音乐的起源，有实物可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9000年的舞阳贾湖遗址，在此遗址中所出土的骨笛对于改写和丰富中国音乐发展史，具有特殊的意义。骨笛是用鹤鸟的肢骨钻孔所制。其中最为完整的属于这一遗址中期的骨笛，经测定已经具备七声音节结构，至今仍可吹奏旋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吹管乐器。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认为中国乐律都是以五音为主干。骨笛的出土，将中国七声音阶的历史提前到8000年前。它是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最完整、音乐性能最好的音乐实物。

人们习惯将中华文明起源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联系起来。音乐的起源和乐器的发明也是这样。在古代文献中，经常提到的“伏羲氏灼土为埙”、“女娲制笙簧”、“伏羲神农氏斫桐为琴、绳丝为弦”，特别是尧的乐官夔、黄帝的乐官伶伦，都是专职的音乐人。音乐的起源、乐器的发明，与传说中的帝王关系密切，这是中华民族将音乐视为治国安民的重要手段的特殊观念。而距今近9000的骨笛的出土，将整个中国音乐史的起源，由文献所记载的三皇五帝时的5000年提前了3000多年，改写了中华音乐文明起源时间，这是了不起的奇迹。

骨笛，从1984年开始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7次发掘，揭秘河南新石器文化早期先民中贾湖人的创造，和对华夏文明起源作出的特殊贡献，贾湖遗址从距今9000年到7800年间，延续了120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出土了早、中、晚三期骨笛30多根，这些有确切的地层关系、地层共存物和科学分析结论的骨笛，是迄今为止世界上

发现最早的管乐器之一。

我们不能低估远古人类的音乐水平，他们的生活空间，没有人造的噪音，而更多大自然美妙和谐的声音。反而我们现代人对乐音的感觉能力在下降。骨笛经专家测音，该遗址早期的四、五孔骨笛（公元前7000～公元前6600年）已经能奏出四声音阶和完备的五声音阶。中期的（公元前6600～公元前6200年）七孔骨笛，能奏出六声和接近七声的音阶。而遗址晚期（公元前6200～公元前5800年）的骨笛分别钻有8孔、9孔，能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以及七声音阶以外的一些变化音。经鉴定，贾湖骨笛是用鹤类动物的尺骨锯去两端关节钻孔而成。制笛之前贾湖人曾经认真计算，在骨管上刻画等分记号、分格计算和画线钻孔，笛子制成后还运用打小孔的方法调整个别孔的音差，制作方法和过程，与现在民族管乐器的制法很相似。已经有了音与音之间距离差别的基本概念，这些音程关系经过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音乐艺术实践，直至明代乐律学家在计算和理论上加以科学化的总结，才使人们对乐律有了新的认识。

贾湖先民的音乐活动证实着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源头所在，在史书上所记载“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葛天氏之乐，就产生在黄河流域。据学者考证，葛天氏曾在河南中部繁衍生息，这些音乐有无传承关系，还需进一步的探索。

夏商音乐在史书上早有记载。而夏商二代之衰，也被后代乐书归之为音乐之靡乱。“启乃淫佚康乐，野于饮食，将将皇皇，管磬以力。”《墨子·非乐》“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城端门，乐闻于三衢。”《管子·轻重》而殷纣则“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最乐戏于沙丘……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夏商音乐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上古音乐中，以编钟为主奏乐器的庙堂雅乐，构成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主体。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乐器，应该从夏代铜铃开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出夏代铜铃，是中国较早的有舌青铜乐器。玉质的管状舌和合瓦形的铃体，有助于良好音质的阐发。直到西周时期平顶山应侯墓中，依然有成编的铜铃作为乐器，其形制与夏代铃极为相近。青铜乐器作为王室礼乐重器，应该从商代铙说起，这是中国最早有音律关系和规定音高的青铜乐器。殷墟妇好墓所出5件组铙，是中原商墓中所出的编组最早、断代可靠的铜铙之一，在2钟破裂测音缺如的情况下，其他3钟仍可基本构成五声音节。如果完全复原，其音节不止五声。近年来在两湖一带，出土不少商代单件大铙，南方铙文化现象引起学者的关注。它与中原乐钟的关系，正屡屡被人论及。但有一点应该受到重视的是，作为乐钟中性能最完备的甬钟，应是商铙的南北汇流中发展而来。这可以从西周早期的陕西长安普渡长田墓和宝鸡茹家庄墓所出成编的甬钟看出。特别是近年出于山西侯马晋侯墓所流散出的晋侯苏编钟，其斡与旋的演变、枚的出现、规范化的形制，都在证明乐钟的最高形式甬钟最初的演变过程。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2001号、2009号墓，新郑郑公大墓和淅川下寺楚国墓地，从北向南、从西周至春秋，甬钟走了它最为完美的渐变轨迹。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的26件王孙诰甬钟，其规模之大、音域之宽、铸工之精、钟体之大成为日前发现春秋时最为完美的一套甬钟。按原出土位置 and 实际测音和演奏结果，这套编钟低音到高音，跨越了

五个半八度，下层大钟作为击节和声的低音区，上层中小型钟作为旋律之用的中高音区。上层双音钟七声俱全，且多半音，可以旋宫转调。这种完美的音列和音质，为晚于此1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的辉煌打下了基础。

1996年以来，在河南新郑，相继出土窖藏编钟10余架共260多枚，其钟悬规则均为两套20件钮钟和4件鐃钟，作为中高音的小型钟与作为和声的低音鐃钟相配，整个音域跨越三个以上的八度，音律和谐，利于旋宫转调以形成丰富多变的旋律特征，较此前的西周礼乐器音节排列有明显的进步。郑卫之声，是两周时期周乐与商乐的汇流中成熟起来的一代新音乐的代表。在复制新郑编钟过程中，音乐考古学者收集了新郑窖藏中10套编钟的音阶检测数据，发现10套编钟正侧鼓音都有商音，而且不少“变徵”、“变宫”的半音存在，具备完整的七声音节结构，且半音丰富。利于演奏丰富多变的调式和旋律，这也许是魏文侯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不知倦的原因所在。

2002年3月在平顶山叶县春秋时期许国国君许公宁墓中出土的不同形制的编钟组群，是由8枚二组编鐃、9枚钮钟和20枚甬钟构成，与新郑郑公大墓、辉县琉璃阁春秋墓的组合方式一样。这说明中原一带特别是在郑卫之音流行的区域，其乐钟的组合，有着相同的风格。

由于北方土质和墓葬保存环境问题，中原琴瑟笙管等丝竹类乐器几乎均不可留存至今，但有关中原琴瑟的文献记载，都证实两周时许多著名的琴师都出于中原。师旷、师襄、师文等，都以非凡的音乐才能、高超的演奏技巧、“内得于心、外应于器”的丰富的音乐内心世界，为后代琴学者所敬仰。信阳长台关楚墓和固始侯古堆大墓出土各类瑟10余架，制作讲究、工艺复杂，有19、21、23、25弦，包罗了两周瑟的主流式样。特别是长台关楚墓所出漆绘锦瑟，面板上金银绘彩的狩猎纹和宴乐巫舞纹，使整个瑟显得华美无比。

在迄今出土的夏商音乐文物中，打击乐器石磬在许多此时期的遗址中都有出土。石磬是起源极早的原始乐器，尚书有载“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相当于新石器晚期已经有石磬出现，河南禹县（今禹州）龙山文化阎砦遗址所出石磬，呈三角形，偃勾明显，并有偃孔，是我国横悬式石磬之源头，河南出土为数不少的夏商石磬，早期多为特磬，即单件的大型磬。这些乐器发音清彻响亮，穿透力强，具有稳定节奏控制音高的作用，这些磬多数有升C和升A的固定音准，殷墟所出虎纹特磬，将特磬的使用和制作都推向了一个高峰。而多种成组的编磬，则为磬这种乐器旋律性能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河南两周墓葬中，磬与钟成为贵族乐器配置中的主要角色。三门峡虢国墓地多为9件、10件一组，平顶山应国墓、豫南淅川楚墓为13件组，洛阳东周墓中出土的23件组，特别是上蔡楚墓中所出“商父之徵”石磬，寓示了这种乐器及其乐律发展的源与流。

两周时期的排箫出土资料仅4处，除曾侯乙墓外，三处都在河南，即商末周初的鹿邑长子口墓的大小相次的骨质排箫4件，春秋时期信阳光山黄君孟墓出土的竹管排箫

4件和浙川下寺的13管石质排箫1件，3种质地的箫管，音质各有千秋。“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从两周中原墓葬所出土的乐器配置上，可以看出我们华夏先民对音乐审美的独特理解。无论从原始社会的陶乐器，还是夏商时期的金石类打击乐器，乃至在河南鹿邑商末周初长子口墓中，乐队的配置可见管乐4排箫与编铙、磬组成。到了两周时期，有《诗经》中提到的乐器达29种之多，古代文献中所论及的八音的配置，正是对上古音乐配器规律的一个总结。从《礼记·乐记》中看，钟磬琴瑟箫管在上古所扮演的角色，除了自身器乐功能外，更主要的还是其作为贵族礼乐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中原乐音有着如此久远的渊源，在两周时期中原正声被视为正统的王室音乐之源头。在中国第一部乐歌总集《诗经》中，被称为二雅的宫庭音乐实际上称“大夏”、“小夏”，这是周祖述夏人，视中原传统为王室正统音乐的因由。“诗言志、歌咏声”，上古时期，士人与贵族在交往中，常常是赋诗言志和献诗陈志，由诗来婉转表达自己的意志与情感。一部《诗经》，可歌、可弦、可舞、可诵。《史记》曾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的记载。《诗经》成书时间上下绵延500多年，作者来自黄河流域广袤的大地。在《诗经》的风、雅、颂三类诗歌中，“国风”是黄河流域15个诸侯国的民间歌乐，其中9国的歌诗自河南及河南周边地区。两周音乐的音容虽已消泯，我们可以从这部乐歌总集中，在大量出土的两周音乐文物中，找到这股中原音乐的潜流。

汉代音乐，与当时社会审美情趣密不可分。汉代音乐在继承先秦宫廷雅乐和民间新乐的基础上，有了崭新的变化。说明汉初国家即对“雅乐”和“俗乐”的生存和发展地位同时进行了确认。艺术家们在乐府统领下，广采民间精品，集先秦雅乐、秦声、楚声、郑声，及各族群民间多种音乐风格为一体，雅俗相容、包罗万象以创制新乐。这种音乐取向，决定了汉代音乐艺术发展的走向逐步由以祭祀、礼仪及供宫廷贵族极少数人享用宫廷庙堂音乐，转而为广大范围的民众所同时享用。更多人表演、创作和参与，带来了汉代音乐艺术的形式和内容空前丰富多彩和前所未有的宏大规模。

从两汉出土音乐文物中可看，西汉时以贵族宴享燕（宴）乐为中心的音乐形式，在庄园经济对贵族经济的冲击下而改变，民间音乐中乐舞百戏的综合类表演在民间大行其道。这其中不仅是器乐，舞蹈、说唱、杂技等多种表演形式都同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音乐从宫廷走向民间，达官贵戚和富商吏民，竞相蓄伎养婢，表现民间歌舞音乐的俑群，在社会习俗的变化中开始增多，且在两汉各大经济中心都市如齐鲁、宛洛、巴蜀都有集中的体现，在中原的帝都洛阳一带和帝乡南阳等地，贵戚、官吏和富人墓中，多见形制和组合不同、表现热烈奔放的民间俗乐的乐舞百戏、杂技等俑的乐舞俑群。而在河南出土的大量汉画像砖、石、壁画中，舞乐百戏的题材更是占有相当的比重。在承三代音乐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形象资料可供参考。不同规模的乐队，丰富多样的乐器，纷繁复杂的演奏方式。我们在画像石刻中，同时可以找到旧有和新出现的乐器和演奏方法，可以从如痴如醉的乐手情态中探索汉乐的节奏和旋律特点，从不同姿态的长袖舞女形象中建构完整的舞蹈动作序列。